社会科学与教育 2026年第9期
ISSN: 3079-4420

方以智的科学观：融合阳明心学的质测和通几

金菁，蔡宏兵*，王贝贝
江苏师范大学中俄学院，江苏徐州，中国
*通讯作者

【摘要】方以智的“质测”与“通几”之学，构成中国古代科学观的独特形态。本文从阳明心学视角出发，梳理方氏家学传承与核心文本，论证其科学观并非对心学的背离，而是框架内的创造性转化：以“心物合一”取代“心即理”，以“藏悟于学”将良知下贯为实证动力，以“至善统有无”贯通形下质测与形上通几，“质测即藏通几”实现了经验实证与哲学思辨的辩证统一。研究表明，中国传统思想内部蕴含发展实证科学的理论潜能，其平衡心学主体性与科学客观性的努力，对当代科学与人文的对话仍具启示意义。

【关键词】方以智；质测；通几；阳明心学；科学观

1.引言

晚明时期，中国思想界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学术转向。针对心学末流“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空疏之弊，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思想家力倡实学，强调经世致用与实证考察。在这一思想谱系中，方以智以其独特的学术路径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与顾、王、黄等人对阳明学持激烈批评态度不同，方以智作为阳明学传承嫡系，“深入阳明学思想内部，充分吸收王畿的良知学之超越，并将超越的精神下贯至实学”[1]，从而在心学的理论地基上建构起一套以“质测”与“通几”为核心的科学观。

方以智将全部学术区分为“质测”“通几”“宰理”三类：“考测天地之家，象数、律历、音声、医药之说，皆质之通者也，皆物理也。专言治教，则宰理也。专言通几，则所以为物之至理也。”[2]在《物理小识·自序》中，他进一步界定了质测与通几的内涵：“寂感之蕴，深究其所自来，是曰通几；物有其故，实考究之，大而元会，小而草木蠢蠕，类其性情，征其好恶，推其常变，是曰质测。”[3]这一区分不仅确立了自然研究在学术体系中的独立地位，更通过“质测即藏通几”的命题，将经验考察与形上思辨贯通为一个有机整体[4]。

然而，学界对方以智科学观的研究长期存在两种偏向：其一，将其简单归入明清实学思潮，视之为对心学的反拨与超越，忽视了心学作为其思想底色的深层作用；其二，侧重梳理其“质测”方法与西方近代科学的相似性，以“中国的伽利略”之类比框架予以格义，反而遮蔽了其科学观的内在理路与独特品格[5-7]。事实上，方以智的科学观始终是在阳明心学的底层世界观上展开的：他对“物”的实在性的肯定，源于对心学“扫物尊心”流弊的反思；他对“通几”的追求，承续着心学“求理于心”的超越指向；他对质测与通几辩证关系的论证，更是直接运用了心学“有无之辨”的理论成果。

基于此，本文试图从阳明心学的理论视野出发，重新阐释方以智的科学观。文章首先追溯方氏家学与阳明学的传承谱系，揭示其科学观的心学渊源；继而分别剖析“质测”的实证方法与“通几”的形上追求，阐明二者各自的理论内涵；在此基础上，重点论证质测与通几如何在阳明心学的融贯下实现辩证统一；最后评析其历史地位与当代启示。本文认为，方以智的科学观是中国传统哲学内部生成的一种独特的科学认识论形态，其在心学主体性与科学客观性之间的理论平衡，为理解中国科学思想的内在发展逻辑提供了重要范例，也为新时代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科研范式提供了思想资源。

2.方以智科学观的心学渊源

方以智的科学观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深植于方氏家族四代的心学传承之中。方以智的曾祖父方学渐编著《心学宗》，“该书始于尧舜禹，终于王阳明与泰州学派的王艮”[1]，明确将家学锚定在心学传统之中。虽然《明儒学案》将方学渐归入泰州学派，但他与李贽等激进的泰州学者不同，“师承张绪、耿定理，温和且偏于保守”，“与东林学派顾宪成、高攀龙的学旨相近，重视至善，驳

斥王畿的‘无善无恶’”[1,8]。这一学术取向奠定了方氏家学的基本品格：既坚守心学立场，又力纠心学末流的空疏之弊，在“有”与“无”之间寻求平衡。

方以智的祖父方大镇直接传承方学渐的《心学宗》，并将家学推进到全国阳明学讲会的中心。他参与了明末规模最大的阳明学讲会——北京首善书院，与邹元标、冯从吾等江右王门领袖论学，“以念庵砺，完新建政”[9]。罗洪先（念庵）是江右王门的巨擘，方大镇“由学罗洪先以成王阳明之学”，这一学术路径“有利于方以智承接江右王门，并且以‘至善’贯通‘有’‘无’”[1]。方大镇的学术活动为方以智储备了丰富的心学思想资源，也确立了家学“由泰州而入江右”的发展方向。

对方以智影响至深的还有其外祖父吴应宾。吴应宾“发扬王阳明的《古本大学》，著有《古本大学释论》，以‘无我’诠释‘止至善’，贯通王阳明的‘至善者心之体’与‘无善无恶者心之体’”。如果说方学渐、方大镇代表了心学“有”的维度——强调至善的实有性与道德践履的切实性，那么吴应宾则代表了心学“无”的维度——重视良知本体的超越性与无滞性。吴应宾指出，“有”导致“瞪目见花”，“无”导致“失志健忘”，“亦有亦无”导致“寒热交攻”，“非有非无”导致“阴阳俱脱”，并试图以“无我”“尽性”立宗，从功夫论角度消解有无之辨的对立。方大镇持“有”似钱德洪、许孚远，吴应宾论“无”似王畿、周汝登，“两人辨析二十余年，共同‘孕育’了方以智，促成了阳明学理论发展的又一个高峰”[10]。

此外，方以智的启蒙老师王宣（号虚舟子）祖籍江右，“受益于方学渐讲学”，其阳明学代表作《书〈青原惜阴卷〉后》“以江右王门为主，精要评点阳明学者及其学旨”[1]。而觉浪道盛作为曹洞宗高僧，与焦竑、周汝登等注重儒佛会通的阳明后学交游，也为方以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启发[11]。正是在“赤老人（方大镇）、缁老人（吴应宾）、黄老人（王宣）及一杖人（觉浪道盛）”的共同熏陶下，方以智形成了兼综有无、贯通三教的学术品格[12]。

方以智晚年驻锡江西青原山，此地既是曹洞宗祖庭，也是江右王门讲会的中心。他与施闰章重振青原山传心堂，《传心堂约述》所述的阳明学传心法脉“起于王阳明，终于方以智”，勾勒出“王阳明、欧阳德、邹守益、罗洪先、聂豹、胡直、王时槐、邹元标、方以智、施闰章的薪火相传法脉”[9]。这一法脉的确立，标志着方以智自觉地将自己定位为阳明学的传承者与发展者，而非心学的叛逆者。理解了这一传承谱系，才能真正理解方以智科学观的心学底色。

方氏家学传承及其对方以智的影响可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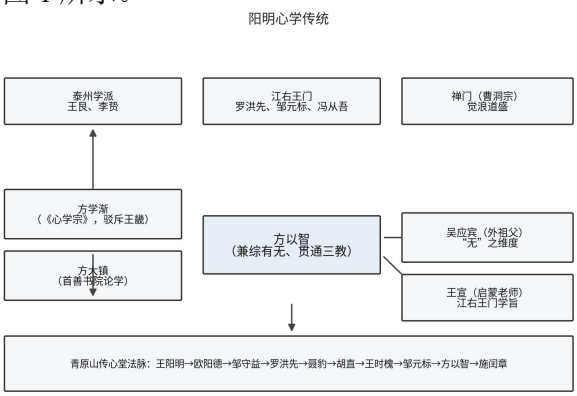


图 1.方氏家学传承与方以智思想渊源

3.“质测”：实证科学方法的建构

“质测”是方以智科学观的核心概念之一。在《物理小识·自序》中，他给出了经典定义：“物有其故，实考究之，大而元会，小而草木蠢蠕，类其性情，征其好恶，推其常变，是曰质测。”[3]这一定义包含了丰富的方法论内涵。

首先，“物有其故”肯定了客观事物具有自身的原因和规律。“故”即事物之所以然，是事物内在的本质与规律。在方以智看来，天地万物无论宏观如“元会运世”（宇宙历史的大周期），还是微观如“草木蠢蠕”（草木昆虫等微小生命），都有其“故”，都可以成为认知的对象。这一立场与其“盈天地间皆物也”[3]的气一元论自然观相一致：整个宇宙都是客观的物质存在，都有其可考察的规律。

其次，“实考究之”强调了考察的实证性。“实”即切实、实地、实证，反对空谈臆度。方以智对晚明“穷理见性之家反不能详一物”的风气深恶痛绝，认为离物言理犹如“拨波而求水”，终将流于虚空。“考究”则包含观察、分类、验证、推理等多重认知活动，是一种系统性的探究方法[13]。

再次，“类其性情，征其好恶，推其常变”具体展示了质测的操作程序。“类其性情”是对事物进行分类，把握各类事物的性

质与特征；“征其好恶”是通过经验验证来考察事物的属性与趋向（如药物的寒热温凉）；“推其常变”则是在分类与验证的基础上，推求事物变化的常规与变例，把握其规律性。这三个环节构成了一个从分类、验证到规律推导的完整认识过程，已具有近代科学方法论的雏形[14]。

方以智还提出了“以费知隐”的认识原则。“费”指事物显见的现象，“隐”指隐藏在现象背后的本质与规律。他说：“推而至于不可知，转以可知者摄之，以费知隐，重玄一实，是物物神神之深几也。”意思是，对于那些不可直接感知的深奥道理，要通过可以感知的现象来把握，从显见的现象推知隐藏的本质。这一原则与近代科学“从现象到本质”的认识路径高度一致，也体现了方以智对人类认识能力的充分信心[15]。

在质测活动中，方以智特别重视“数度”的作用。他认为，“数度”是连接质测与通几的桥梁：“物有则，空亦有则，以费知隐，丝毫不爽，其则也，理之可征者也。”[3]事物的规律可以通过数量关系来表征和验证，“丝毫不爽”意味着规律具有精确性和可验证性。方以智在天文、历法、音律等领域的研究中广泛运用数学方法进行定量分析，这使得他的质测之学超越了单纯的经验观察，达到了较高的理论化水平[15]。

4.“通几”：形上原理的探究

如果说“质测”指向对具体事物的实证考察，那么“通几”则指向对事物普遍原理的形上探究。方以智在《物理小识·自序》中界定：“寂感之蕴，深究其所自来，是曰通几。”[3]“寂感”出自《周易·系辞上》“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指心体的寂静与感通；“蕴”即蕴藏、内涵；“深究其所自来”则是要追溯事物存在与变化的终极根源。质言之，“通几”就是要深入探究隐藏在现象背后的宇宙根本原理与变化契机。

“几”是中国哲学的重要范畴，出自《周易·系辞下》“知几其神乎”“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在方以智这里，“几”既指事物变化的微妙契机，也指宇宙万物的根本原理。“通几”之“通”，意味着不是对“几”的局部把握，而是融会贯通的整体洞见；不是对某一类事物规律的认识，而是对宇宙根本原理的体认。就此而言，通几之学所探讨的，正是事物的普遍原理与规律动力[5]，属于形而上学的层面。

方以智将知识分为“至理”“物理”“宰理”三个层次：“专言通几，则所以为物之至理也。”[2]“至理”是最高层次的理，是万物之所以为万物的终极根据；“物理”是各类具体事物的特殊规律，由质测来研究；“宰理”则是社会治理的道理，属于政治伦理领域。通几所追求的“至理”，是统摄一切物理的根本原理，是对宇宙整体的终极把握[16]。

在方以智看来，通几与质测的关系是形上与形下、普遍与特殊的关系：质测之学侧重于对形而下具体事物的考察，通几之学则侧重于对形而上普遍原理的探求[4,5]。但这并不意味着通几可以脱离质测而独立存在。恰恰相反，方以智强调“质测即藏通几者也”[17]，普遍原理就蕴藏在具体事物之中，只有通过对具体事物的实证考察，才能通达对普遍原理的认识。这一立场使他的通几之学区别于传统的玄学思辨，始终保持着与经验世界的联系。

通几的追求也体现了方以智对心学“求理于心”传统的继承。阳明心学主张“心即理”，认为天理不在外物，而在本心。方以智虽然将“物”纳入认识过程，但他对“至理”的追求最终仍指向心体的自我认知。“寂感之蕴”的提法本身就表明，通几不仅是对外在规律的认识，更是对心体寂感之妙的体悟。在这个意义上，通几是心学“致良知”在科学领域的转化形式：良知不再仅仅是道德本体，同时也是认识宇宙真理的本体根据[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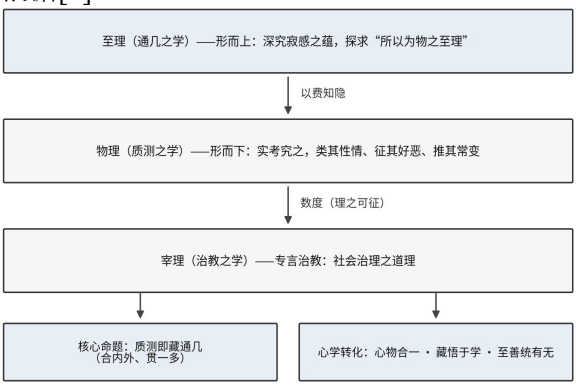


图 2.方以智“质测—通几”认知结构示意

质测与通几的层次关系及“以费知隐”“数度”等认识环节可如图 2 所示。

5.质测与通几的融贯：阳明心学视域下的科学观

5.1“质测即藏通几”：寓通几于质测

方以智科学观的核心命题是“质测即藏

通几”。在《物理小识·自序》中，他明确指出：“质测即藏通几者也，有竟扫质测而冒举通几以显其宥密之神者，其流遗物。谁是合内外、贯一多而神明者乎？”[3]这一命题包含两层含义[17]：

第一，质测本身就包含着通几。对具体事物的实证考察，不是与普遍原理无关的低级活动，而是普遍原理得以显现的场所和途径。“藏”意味着通几不是外在于质测的附加物，而是内在于质测之中的本质内容。正如“火丽薪而然”，普遍原理（通几）必须借助具体考察（质测）才能显现和被把握。这从根本上反对了“扫质测而冒举通几”的玄虚学风，确立了经验考察在认识活动中的基础地位。

第二，通几不能脱离质测而独立存在。如果抛弃质测，空谈通几，就会“遗物”——脱离客观事物，沦为纯粹的主观臆造。方以智批评这种做法是“显其宥密之神”，即标榜自己的玄妙高深，实际上却空洞无物。他要求“合内外、贯一多”，即将内心的体认与外物的考察结合起来，将对多样事物的认识与对统一原理的把握贯通起来，方能达到“神明”的认识境界。

“质测即藏通几”的命题，与阳明心学的“知行合一”有着深刻的理论同构性。王阳明主张“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18]，知与行不是两个分离的过程，而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方以智的质测与通几亦然：通几是质测的“主意”（指导方向和最终目标），质测是通几的“功夫”（实现途径和具体方法）；质测是通几之“始”（认识的起点），通几是质测之“成”（认识的完成）。质测与通几的统一，正是“知行合一”在科学认识论中的体现。

同时，这一命题也体现了“下学而上达”的为学路径。孔子说“下学而上达”，王阳明将其解释为通过日常的人伦践履（下学）来达到对天理的体认（上达）。方以智则将这一路径拓展到科学领域：通过对具体事物的质测（下学），来通达对宇宙根本原理的通几（上达）。“藏悟于学”的纲领在这里得到了具体的落实：“学”（质测）本身就包含着“悟”（通几），“下学”本身就是“上达”[19]。

质测与通几在研究对象、方法、层次与心学关联上的对举见表 1。

表 1.质测与通几之学的对照

维度	质测	通几
研究对象	具体事物（草木蠕、元会运世）	宇宙根本原理（事物存在与变化的终极根源）
核心方法	实考究之：观察、分类、验证、推理	深究其所自来：寂感之蕴的体悟
认识环节	类其性情、征其好恶、推其常变	以费知隐、数度（理之可征）
知识层次	物理（形而下）	至理（形而上）
心学关联	心物合一，确立客观性维度	致良知的科学转化，保留主体性维度

5.2 心学主体性与科学客观性的统一

方以智科学观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在心学主体性与科学客观性之间寻求平衡。阳明心学高扬主体的能动性，主张“心外无理”“心外无物”，但这种主体性如果被绝对化，就可能消解客观事物的独立性，导致主观臆断。方以智通过“心物合一”的认识论框架，既保留了心学的主体性维度，又确立了科学认识的客观性要求[20,21]。

一方面，方以智继承了心学对认知主体的重视。他认为，认识活动不是主体对客体的被动反映，而是心与物的交互作用。“格”被诠释为“感”“通”，强调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感通无碍。在质测活动中，主体不是中立的观察者，而是以其固有的认知结构和价值取向参与认识过程。通几对“至理”的追求，更是离不开心体的寂感之妙——只有心体达到虚明灵觉的状态，才能洞察宇宙的根本原理。这种对主体性的重视，使方以智的科学观区别于机械唯物论的反映论，充分肯定了认知主体的能动作用。

另一方面，方以智又通过“离物无心”的命题和“实考究之”的方法，为科学认识确立了客观性的维度。他强调“物有其故”，客观事物有其自身的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质测必须“实考究之”，以经验事实为依据，不能主观臆断。他批评“舍物以言理”的做法，认为脱离客观事物的“理”不过是主观虚构。在具体的科学研究中，他注重观察、验证和数据，要求一切结论都有经验证据的支持。这种对客观性的追求，使他的科学观超越了心学可能导致的主观主义，具备了近代科学的实证品格[21]。

心学主体性与科学客观性的统一，在方以智的“因物则无心”思想中得到了集中体现。他在论及阳明学发展的第五阶段时说：

“因物则无心矣，知法则无物矣。”[1]这里的“因物”是指顺应事物的客观规律，“无心”不是取消主体，而是破除主观成见；“知法”是指把握事物的规律，“无物”不是取消客体，而是超越对具体事物的执着。通过“因物”而达到“无心”，主体完全顺应客观规律，不再有主观偏见；通过“知法”而达到“无物”，主体把握了普遍规律，不再局限于具体事物。这正是心学“无善无恶心之体”在科学领域的转化：心体不再执着于主观的善恶判断，而是如实地反映客观事物的规律。

这种统一也体现在方以智对“分别”与“无分别”关系的处理上。他借助华严宗的辩证思维，提出“分别即无分别”，认为对事物差异性的细致辨析（分别）本身就是对世界统一性的把握（无分别），不能脱离具体的分别去追求抽象的无分别。这一思想既肯定了质测对事物进行分类辨析的必要性（科学的客观性），又强调了这种辨析最终指向对统一原理的通几（心学的超越性）[22]。

6.方以智的科学观的启示

方以智的科学观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首先，他是中国古代最早对科学方法论进行系统反思的思想家之一[4]。“质测”与“通几”的区分，以及“质测即藏通几”的命题，构成了一套完整的科学认识论体系，涉及科学认识的对象、方法、目标和验证等诸多方面。这在中国古代思想中极为罕见，标志着中国传统科学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其次，方以智的科学观代表了明清之际实学思潮的一个重要方向。与顾炎武的经学考据、黄宗羲的政治批判、王夫之的哲学重构不同，方以智将实学的重点放在自然研究上，通过“质测”之学将实证精神贯彻到对自然世界的考察之中。他的工作为中国传统学术向近代科学的转型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被侯外庐誉为“中国的百科全书派大哲学家”[23]。再次，方以智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他是最早系统接触和吸收西方近代科学的中国学者之一，其“借远西为郯子”的开放态度和“彼之质测，犹未备也”的批判精神，为如何处理中西文化关系提供了一个典范[24]。他既不盲目排外，也不盲目崇外，而是以我为主、批判性地吸收外来文化，这种态度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方以智的科学观展示了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阳明心学——与科学之间的积极互动关系。长期以来，有一种观点认为儒家心学与科学精神是对立的，心学的“向内求理”阻碍了对自然的客观研究。方以智的思想表明，心学并非必然与科学对立，经过创造性的转化，心学的主体性精神、辩证思维和超越性追求完全可以成为科学发展的积极动力。他以“心物合一”取代“心即理”的单向度立场，以“藏悟于学”将超越性下贯为实证探究，以“至善统有无”的辩证思维[25]贯通形下与形上，这些理论工作为心学与科学的融通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26]。

在科学与人文日益交融的今天，方以智的科学观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其一，方以智“质测即藏通几”的思想提醒我们，科学研究不应停留于碎片化的经验积累，而应追求对普遍原理的深层把握。在“学科碎片化”日益严重的当代，各学科之间的壁垒越来越高，研究者往往局限于狭窄的专业领域，缺乏对世界整体的理解。方以智强调质测与通几的统一，主张通过具体的实证研究通达对宇宙根本原理的认识，这对于打破学科壁垒、促进跨学科研究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其二，方以智在心学主体性与科学客观性之间寻求平衡的努力，为我们反思科学的价值维度提供了思想资源。近代科学以来，实证主义思潮强调科学的“价值中立”，将科学与人文截然二分，导致了科学主义的泛滥和人文精神的失落。方以智的科学观表明，科学认识从来不是纯粹客观的，主体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精神境界始终参与其中；同时，对客观真理的追求也不是与人文关怀对立的，而是可以成为精神超越的途径。科学与人文的融通，不是外在的拼接，而是内在的统一。

其三，方以智三教合一的学术视野和“坐集千古之智”[2]的文化胸怀，为我们处理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典范[27]。在全球化的今天，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碰撞日益频繁，如何在保持文化主体性的同时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秀成果，是一个重要的时代课题。方以智“借远西为郯子”的态度——既开放包容，又以我为主；既虚心学习，又批判吸收——对于我们今天处理中西文化关系仍有重要的启发。

7.结论

本文从阳明心学的理论视野出发，对方

以智以“质测”与“通几”为核心的科学观进行了系统阐释。研究表明：其一，方以智的科学观深植于方氏四代家学的心学传承，他对“物”的实在性的肯定、对“通几”的形上追求以及对质测与通几辩证关系的论证，均以阳明心学的理论资源为底色，是对心学的创造性转化而非背离；其二，“质测”以“实考究之”“以费知隐”确立了实证方法的基本格局，“通几”承续心学“求理于心”的形上追求，“质测即藏通几”命题以“心物合一”“藏悟于学”“至善统有无”为中介，实现了经验实证与哲学思辨、心学主体性与科学客观性的辩证统一，构成中国传统哲学内部生成的一种独特的科学认识论形态。

本研究仍存在不足之处：其一，分析主要依据《物理小识》《通雅》等传世文本的解读，对方以智大量未刊稿及相关科学实践活动的文献考据尚不充分；其二，关于心学与科学互动机制的解释以思想史梳理为主，尚未充分引入科学社会史、知识社会学的分析框架；其三，质测与通几的对照分析侧重共时性结构，对方以智思想的前后演变关注不足。

展望未来，后续研究可从三方面深化：一是加强对方以智原典文献的整理与考据，还原其科学观形成的具体语境；二是将方以智与近代科技革命及同时代中西科学交流进行更细致的比较研究，揭示中国传统科学思想向近代转型的内在机制；三是发掘“质测即藏通几”所蕴含的实证与思辨相统一的精神，为当代科学哲学、新文科建设与科技人文对话提供思想资源，助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话语体系。

参考文献

[1] 张昭炜.方以智与阳明学[N].光明日报，2019-11-16（11）.
[2] 方以智.通雅[M]//方以智全书.合肥：黄山书社，2019.
[3] 方以智.物理小识[M]//方以智全书.合肥：黄山书社，2019.
[4] 郭金彬，黄长平.论“寓通几于质测”——方以智的科学思想[J].贵州社会科学，2010（1），31-37.
[5] 郑万耕.论“质测”与“通几”之学的本义[J].哲学研究，2001（7），35-40.
[6] 关增建.方以智“通几”与“质测”管窥[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1），11-14.
[7] 张世亮.方以智“质测”与“通几”之学研究述评——一种方法论的视角[J].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1（4），34-37.
[8] 张昭炜.天泉证道的问题与解决方案——方学渐对于龙溪学的批判与方以智的统合[J].中国哲学史，2023（4），75-84.
[9] 张昭炜.传心堂法脉薪火相传：从王阳明至方以智[J].浙江学刊，2016（4），18-23.
[10]廖璨璨.至善统善恶：方以智与晚明无善无恶之辨[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62（6），88-95.
[11]邢益海.道盛与方以智师徒的“托孤”说[J].贵州社会科学，2012（7），15-19.
[12]张昭炜.方以智的心性思想根源及学术理想[J].中国哲学史，2017（4），71-76.
[13]吕锡琛.论方以智科学实践中的科学精神[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5），28-31.
[14]王永礼，胡化凯.方以智“光肥影瘦”说的实验研究[J].自然科学史研究，2002，21（4），332-337.
[15]张世亮.以费知隐，重玄一实——方以智“质测”与“通几”之学的方法论特点[J].中国哲学史，2013（4），106-112.
[16]张岱年，陈来.关于方以智的本体论与方法论[J].江淮论坛，1984（2），77-85.
[17]刘元青.“质测即藏通几”说申论——兼论方以智的中西文化观[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6），27-31.
[18]王守仁.传习录译注[M].王晓昕，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8.
[19]孙国柱.“学”的本体、工夫与境界——以方以智为中心的讨论[J].中国哲学史，2021（4），101-106.
[20]廖璨璨.方以智的“格物穷理”说及其对明清之际西学的回应[J].中国哲学史，2018（4），101-105.
[21]杨爱东.方以智对传统“格物致知”论的突破[J].湖北社会科学，2015（2），115-117.
[22]郭振香.知识维度的格致论建构——论方以智的格致研极思想[J].兰州学刊，2024（6），14-25.
[23]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4卷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24]许苏民.方以智为什么说西学“拙于言通

几”?——论方以智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J].江淮论坛，2014（5），5-13.
[25]田海舰.方以智《东西均》矛盾思想探析[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4），67-69.
[26]张昭炜.方以智哲学思想的新定位[J].世界宗教研究，2023（11），8-22.
[27]程曦.从《东西均》“药”喻看方以智“集大成”思想的特质[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8（2），131-137.